

中国文化的整体观与生命力

□郑铁生

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什么是中国文化?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中国文化绝不等同于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早在春秋时代,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天下,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是“束发右衽”还是“披发左衽”,孔子把发式和服装的不同看成是夷夏之别的最直观表现,显然是一种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观念。由于孔子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一概略的说法在后世流传广泛,至今把“披发左衽”视为野蛮,视为与文明的区别。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根本所在。

中国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古代中原文化,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大融合的多元文化。当然,文化融合一般以文明程度较高,政治和经济实力较强为后盾的文化融合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文化,促成不同文化的融合,吸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合成一种更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我们从中国人文地理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北方,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匈奴、东胡、林胡、楼烦、乌孙、西域各族,这些少数民族大都以“戎”、“狄”的名称出现在史册。其中,匈奴是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自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49年南匈奴降汉,节节南迁,人居内地,与汉人杂居。其后,汉族与匈奴的关系虽呈现出复杂多变,但总的的趋势是民族融合。

东北早在商朝初期居住着一个古老民族东胡。乌桓和鲜卑是东胡部落联盟中两个比较大的部落集团。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顿单于灭掉了东胡。东胡剩余部落长期受匈奴的统治。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朝击败了匈奴,迁乌桓入塞,结束了87年受匈奴统治历史。

西北山陕高原及河北太行山的东麓,主要是北狄,在春秋、战国时分散华北平原以及河北省的北部和中部。马长寿在《北狄与匈奴》一书中指出:“秦、汉、三国时的狄人,除了姓氏以外,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民族特征了。”

西南的氐和羌都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商代就先后出现于历史记载。到了隋、唐时期,氐族已逐渐汉化了;羌族中居住在秦、陇地区的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还有一小部分居住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仍为羌族,屡世绵延至今,和汉族的历史是同古同今。

由此可见,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大趋势,既是汉族与多民族古今同在的历史,又是汉族与多民族大融合的多元文化。所以,中国

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古代中原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和多元的范畴

目前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底本一个不可忽视的倾向,就是“选篇集萃”,缺乏文化内容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个问题是导致阐释中国文化缺乏深度和肤浅的基本根源。我们认为,文化只有在客观地反映人类对自然和人类自身活动的真理性认识的时候,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是各种文化思想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驱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厚德载物,具有充分的精神底蕴和活力,所以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不断壮大,虽经无数劫难而终能重新走向辉煌。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始终贯穿整体观和多元的范畴。

比如先秦时期孔子和儒家,老子和道家,还有法家、墨家等学派都有他们各自独特的学术观点、思维方式和代表著作,也就是说形成多元的文化范畴。但很少注意到先秦诸子学说中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元文化思想核心,这就是中国文化元典——《周易》所阐述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规律,阴阳相推、日月运行,是变动不居的,这正是中国元典文化的认知思维和根本精神。

《周易》所阐述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一阴一阳之谓道。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展开提供了一种会通的可能和方向,其有关内容和核心范畴则成为儒道两家思想内在延展的基点和前提。《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有关于孔子喜《易》,读《易》、学《易》、解《易》的明确记载。《论语》亦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我们再看《周易》与老子的关系:有无对举的哲学范畴,来源于《易经》;到了老子手里,则被大大地推进了、发展了。老子在《道德经》中首先从思辨哲学高度提出了道的“无名”与“有名”问题,接着,便论述有无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提出了“有无相生”的著名观点。再看与《易经》《道德经》齐名于古代三大“经”书的《黄帝内经》,是一部具有人文科学特色的医学著作。阴阳学说是《黄帝内经》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防治和养生等的重要理论,贯穿在各个方面。以五脏为中心,把六腑、五气、五神、五志等构成五脏系统,形成一个表里相依、内外相关的整体。简括地说,先秦诸子百家虽然个性纷呈,但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元典文化的认知思维和根本精神。

中国元典文化产生的时代正是人类文化上的轴心时代。中国古代的圣人有孔子和老子,古印度的圣人有释迦牟尼,古希腊的圣人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都相隔不到50年,出了4位对东西方文明影响极为深远的大圣人。释迦牟尼是佛教思想的创始人,西方哲学往上追溯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我们现在谈中国的思想史,就不能不谈儒家和道家。所以这个时代曾被称为人类文化上的轴心时代。

作为中国文化轴心时期的杰作——《周易》,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尊奉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周易》所表述的自然哲学、人文哲学等思想,无不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中国文化所有重要的思想与理论,都没有脱离《周易》的“思考和创造”,都离不开《周易》提供的“精神的动力”。其中“阴阳”的生化构成是《周易》的核心思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易传》自觉地顺应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提出了著名命题:“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从《易经》到先秦诸子所共同组成一部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史,始终贯穿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

力避文化内容的庞杂散漫,除却强调中国文化的整体观而外,还要突出具体的多元的文化范畴,来体现它内在的系统性和整合性。比如佛教在中国历经近2000多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可以简捷地概括为佛教中国化,或者说本土化以后,隋唐时期创造了中国禅宗和观音文化,形成中国佛教的范畴。特别是观音在中国的世俗化后,由男变女,寻声救苦,解危救困,传播佛法,普渡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广泛传播和深入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过程中,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对铸造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形成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构建民族的传统伦理,有着重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化整体观的视野审视,把握不同的文化范畴,才能准确地解决具体的文化现象。比如龙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流传最广、普及面最大的一个范畴。但由于封建帝制的覆灭,龙文化与现实生活形成断层,人们对在中国大地上最常见的龙之九子的形象,也逐渐陌生了。但历史文化遗产留存下的龙之九子的形象,几乎遍布所有文物古迹的地方。而有意思的是龙之九子个个不像龙,都是龙的变形:如庙宇宫寺里驮着石碑形如乌龟的是龙之子赑屃;蹲在殿宇屋脊上形如兽的是龙之子螭吻;立于监狱大门左右,形似狮子威震镇邪的是龙之子狴犴;古钟上犹如一个兽钮,性好吼叫,有神力的是龙之子蒲牢;经常出现在钟鼎彝器上好饮食的是龙之子饕餮;刻在香炉上好烟火的是龙之子狻猊;装饰在武器的柄把上,怒目而视,性好杀的是龙之子睚眦;佛像立于桥柱头上,性好水的是龙之子蚣蝮;形如螺蚌,性好闭口,立于大门铺首的是龙之子椒图。这些

龙子的形象因个个不像龙,所以有的就以形取貌,解说成各种兽类,与龙文化相差甚远。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是几千年来文化传统基因,依旧流贯在我们的身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性格和行为,这才是需要我们大力开掘的根本内涵。而恰恰这个根本问题还没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周易》作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源头之一,其“观物取象”的认知思维对后世的哲学、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而巨大。可以说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在它的熏陶下锻炼成长和提高的。阴与阳是对立面的统一体,呈现相反相成的状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互依互反,生生不已,变化无穷,这便成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也就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源。《易经》重要思想是强调“变”,“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万物以阴阳之道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从根本上说,大自然的运动变化,是《易经》系统的内在变化的蓝本。要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机警灵活,不拘常规地运用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自己永远处于一种恰当有利的位置。因此,它倡导的谦虚谨慎、勤恳诚实、积极作为、刚健柔顺、自强不息等精神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再比如《黄帝内经》在现代社会,不仅国人视为瑰宝,而且越来越被欧美以及日本等国重视,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当代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讲求生活质量的思想相契合。《黄帝内经》中关于“天地人相参”的思想是处处体现的。人体内的脏腑与体表、肌肉、五官七窍都有联系。因此,任何一个局部,都与整体有联系,都可以反映在整体的理念基础上。由此提出一套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养生方法,其中有防重于治的可贵思想。最典型的就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大病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目前,“治未病”已成为医学界的共识。

当前有些人说“简化字隔断了中华文明”,其实,恰恰相反。简化字早在《说文解字》中就出现了。“與”,左右下全删除,简化为“与”。《说文解字》说这两个字相同,也就是说在古代是异体字关系。

“蟲”,下面全删掉,简化为“虫”。在《说文解字》里是两个字,而“虫”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比“蟲”还要早得多。“复”是“復”的简化字,而在《说文解字》同时都收入,只是“復”后来很少用了。当然这里仅仅举几个例证而已,下面略展开说明。

《朱自清讲国学》将《说文解字》列为开篇,表明其在中国文化体系构架中的文化分量和学术价值。《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可称得上是辞书史上的奠基之作,对后世辞书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是训诂学上极有价值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其功不在禹下”的崇高地位。同时也闪耀着睿智的现代语言学思想的理性光芒,现代汉字是由历史上的隶书、楷书直接演变而来的,它们中一部分是繁体的简化字。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人文需求和精神价值成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共简化汉字2236个,90%以上都是历史上出现的俗字,像甲骨文中“从”后来演变为“從”;甲骨文中“云”,后来出现“雲”,便和“说”的语义相分离了;甲骨文中“氣”,隶变以“氣”代“气”。像秦汉时期,出现了许多简体字,如“報”简化为“报”,“東”简化“东”,“當”简化“当”,“稱”简化“称”,書→书,樂→乐,車→车,貝→贝等。像唐宋时代出现“飛”简化“飞”,“縉”简化“余”,塵→尘,鑿→冬,齧→出等,元明清大都如此,就不一一例举了。可以说,简化字是专家把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俗字选择出来,经过整理和改进,其写法只能有一种,又以法定的形式公布出来的。半个世纪实践证明,汉字由繁趋简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简化字既符合《说文解字》归纳的中国造字的规律,又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发挥了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是几千年来文化传统基因依旧流贯在我们的身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性格和行为。无论传承还是向外宣传中国文化,都应把这一部分作为核心内容。

上面简略地点明中国文明带有倾向的问题,之所以把这些问题摆出来,是因为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经纬交错的交叉点上,要实现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又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因此,我们必须搞清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和多元的范畴?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

□李 娜

美学家彭立勋在长期的美学探索中,一直把对审美主体和审美经验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最近出版的美学专著《审美学现代建构论》则是他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再发展。该著把审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来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新的完整的审美学学科体系,更新了审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对推进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审美学现代建构论》中,彭立勋拓展和深化了关于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创新了审美学学科体系。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是审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构建审美学学科体系的出发点。但是,什么是审美经验?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包括那些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等等,都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彭立勋反对将审美学和审美心理学完全等同起来,认为这忽视了审美经验的丰富内涵,把审美经验狭隘化了。彭立勋认为审美意识活动表现为心理活动,但又不限于心理活动。审美意识作为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的反映和反应,具有复杂的结构和不同的水平、不同的层次,包括不同的形式。它既包括审美心理,也包括审美心理之外的其他各种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心理包括审美感觉、知觉、联想、想象、理解、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和过程,是审美意识的不够自觉的、不够定型的形式。除此之外,包括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标准等在内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中的自觉的、定型化的形式。审美心理和其它审美意识形态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标准等意识形态是在审美心理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对于审美心理的提炼和升华,是通过自觉活动形成的定型化的思想观念。审美心理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标准影响下发生的,是受这些审美意识形态制约的。此外,在审美心理活动的基础上,在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制约下,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所产生的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也是审美意识的一种

重要形式。这都是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相关的内容,也都是审美学需要研究的对象,当然是审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包含的各个组成部分。但是,美学家比较重视审美心理部分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相对而言,对于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对于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价值、审美判断、审美评价等问题的研究,则显得较为不足。而以艺术为主体的审美经验,是一种心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对审美经验的考察和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心理学层面,还必须从审美经验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关系深入揭示其社会历史本质和规律性。彭立勋将美学和价值论、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学科结合起来对审美经验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关系做出深入的研究和科学地阐明,完善和创新了审美学学科体系。

在《审美学现代建构论》中,彭立勋更新了审美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审美经验的心理结构和发生机制是怎样的,这是审美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审美经验和认知、道德及其他日常经验的区别主要不在于其构成要素的多寡,它的整体特性也不能由它的构成要素的孤立的特性或其相加的总和来解释,而是要由它的全部心理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特殊结构方式来说明。如果不认真研究在审美经验中感知和理解、知觉和情感、情感和理性、想象和思维、意识和无意识等各种异质要素是以何种特殊方式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不去认真分析美感

中的特殊的认识结构、情感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无法从整体上去认识和把握审美经验的特性和功能。对于人们常常遇到的特殊的审美心理现象以及常常用语描述审美经验的特殊概念和范畴,如直觉性、愉悦性、形式感、移情作用、同情作用、非确定性、不可言说性、意象、趣味、灵感等等,也就不能从整体上给予科学的阐明。彭立勋以系统科学方法论为基础,从审美经验特别是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经验出发,提出了审美心理系统整体论、审美认识结构方式论、审美情感结构方式论、美感发生中介机制论以及审美生成主客体互动论等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独特的审美经验的整体性质和特点不是由心理构成因素的孤立性质或各种心理因素相加的总和所决定的,而是由它的特殊心理结构方式决定的。审美中各种感性认识因素和理性认识因素以特殊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审美认识结构(形象观念、形象思维);审美中情感因素和不同认识因素以特殊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情感与认识相交融的多层次审美情感结构(情景互生、移情作用、同情共鸣、人物内心体验等);审美认识结构和审美情感结构以特殊方式交互作用、相互协调,导致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由和谐的心理活动,最终形成以情感愉悦和心灵感动为特点的审美总体体验。审美经验表现出的特殊心理现象如直觉性、形式感、愉悦性等,都是由于审美心理的特殊结构方式以及美的观念的中介作用所形成的整体效应。彭立勋发现并科学地解

释审美心理的特殊结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审美经验的特殊规律。

在《审美学现代建构论》中,彭立勋不仅善于借鉴西方审美学有价值成果,而且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现代审美学建设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彭立勋积极推进推动中国传统审美学思想创造性转化。彭立勋认为我们必须调整中西美学结合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改变以西方美学为本位和普遍原则,简单接受移植的研究方式,倡导中西美学之间的文化对话,把中西美学的结合看作是对话式的、多声道的,而不是单向的或单声道的,使中西美学结合真正成为一种跨文化的互动,在真正平等而有效的对话的基础上,达到中西美学的互识、互鉴、互补。尽管20世纪以来,对中国古代审美学思想的研究已有重要进展,中国传统审美学思想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范畴正在逐步得到较深入的阐释,中西审美学思想的不同特点也在比较中逐步得到较明晰的揭示,但是对中国古代审美学思想进行全面清理和系统研究仍嫌不足,对中国特有的审美学的范畴、概念和命题进行深刻挖掘和创造性阐发尤显得欠缺。把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思想中某些特殊范畴与西方心理学中的某些概念、范畴简单化地加以类比,甚至削足适履,将前者纳入后者框架和观念之中的情况,也影响着对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思想的真谛和精髓的把握。彭立勋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揭示了中国传统审美学思想的特点。从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的独特语境出发,全面、系统地分析其形成和演变,准确、科学地揭示和把握其内涵和特点,使其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审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是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是从当代现实生活以及审美和艺术实践需要出发,从新时代的高度,对传统审美学思想进行新的审视和创造性阐释,使其与当代审美观念与艺术实践相结合,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报讯 长篇报告文学《赤诚》作品研讨会在日前在武汉举行。《赤诚》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作家寒青继《起航,信义之船》之后创作的又一部传递正能量的作品。

与会专家认为,《赤诚》是一部描绘国税干部为国聚财、为民奉献的作品,讴歌了一位具有强烈事业心、克己奉公、服务为民的时代楷模。作品中的主人公龚克华,是湖北省荆门市国税局掇刀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30多年来,龚克华怀着对党的事业和对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扎根基层,把一个不足15人的税务所,建设成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税务系统曾多次在荆门市国税局掇刀分局召开先进经验现场会,向全国推广“落地生根、敬业至诚、自律自强、奉献为本”的龚克华精神和“团结奋斗、精益求精、爱岗敬业、执德守诚”的经验。

与会者谈到,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的干部和政府职能部门,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长篇报告文学《赤诚》以生动的文笔,多角度、生动地展示了龚克华同志成长、工作、学习、生活、奉献的点点滴滴,在细微处见真情,于平凡处见伟大;作品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既是一部讴歌龚克华动人事迹的优秀作品,又是一部激情澎湃、催人奋进的颂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是一部群众路线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好作品。

《小说选刊》“触电”陕西卫视

本报记者 6月5日,《小说选刊》杂志社与陕西广播电视台签署合作书,双方将在陕西卫视大型全媒体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中进行合作。

据《小说选刊》主编高叶梅介绍,这次合作对刊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如今,纯文学期刊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要求传统文学刊物做出改变。在多媒体发展的时代,纯文学期刊应该并且可以找到更多传播载体。谈到“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她表示,

(欣 阅)

庄逢时海内外微文学奖启动

本报记者 由《福建文学》杂志社、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泉州市孔子学会、《星光》编辑部等单位与菲律宾华美集团、菲律宾博览馆、菲律宾中国华东联谊总会联合举办的2014—2015年度庄逢时海内外微文学奖,日前在福建泉州启动,开始面向海内外作家征稿。本奖项由菲律宾爱国侨领庄永泉捐设立。

该奖项包括微诗歌(限6行内)、微散文(限200字内)、微小说(限500字内),谢绝

(刘志峰)

《创作与评论》举办年度奖颁奖会

本报讯 目前,湖南省文联《创作与评论》杂志社2013年度颁奖会在长沙举行。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党组书记江学恭、党组副书记夏义生,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学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

据主办方介绍,“海子诗歌奖”的设立,是为了扶持与奖掖新世纪以来一批有才华、有成就的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倡导青年诗

《赤诚》:书写公仆的为民情怀